

中国实学思想史

下卷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029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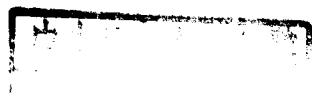
B2
55:2

2612/15 89587

中国实学思想史

下 卷

葛荣晋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京)新 2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实学思想史/葛荣晋主编.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9

ISBN 7-81039-211-5

I. 中… II. 葛… III. 哲学史 中国 IV.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2782 号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国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9.125

字数 1358 千 印数 0,001—2,000 册

全书(上中下卷)定价:125 元

下卷撰稿人(按章为序)

第三编引论	葛荣晋	
第三十三——四十一章	冯天瑜	周积明
第四编引论	葛荣晋	
第四十二章	袁尔钜	
第四十三章	李洪淳	潘畅和
第四十四章	袁尔钜	
第四十五章	潘畅和	
第四十六章	朱七星	
第四十七章	朱七星	

第三编

晚清时期的实学思想

第三编 晚清时期的实学思想

引 论	(1)
第三十三章 道光年间的学风之变与经世派的崛起	(17)
第一节 从“纯学术”走向“致用之学”	(17)
第二节 《皇朝经世文编》及其社会影响	(23)
第三节 道光经世派的崛起	(28)
第三十四章 道光年间的议政风尚与纳谏变法	(62)
第一节 “悲风骤至”与袁世预言	(62)
第二节 “讥切时政,诋排专制”	(66)
第三节 “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	(81)
第三十五章 道光年间的鸦片泛滥与禁烟之议	(88)
第一节 鸦片的输入与经世派的忧患	(89)
第二节 严禁与弛禁之争	(94)
第三十六章 道光年间的“实政之学”	(108)
第一节 漕运积弊与改革	(108)
第二节 盐业衰敝与盐政改革	(115)

第三节	河工研究与对策	(126)
第四节	货币研究与建策	(133)
第五节	农事研究与建策	(142)
第三十七章	道光年间经世派的史地学	(153)
第一节	探究西北史地,以筹边防	(153)
第二节	谈瀛海故实,以谋御外	(166)
第三节	研治当代史,以求济世	(195)
第三十八章	近代洋务派的经世观念	(207)
第一节	曾国藩的经世思想	(207)
第二节	李鸿章、左宗棠的经世思想	(216)
第三节	张之洞的经世思想	(226)
第四节	洋务思想家的经世之学	(237)
第三十九章	洋务派“师夷智”的经世活动	(246)
第一节	“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246)
第二节	“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	(252)
第三节	“开馆教习,远适肄业,收远大之效”	(256)
第四十章	洋务时期的“格致之学”	(265)
第一节	“格致之学”的兴起	(265)
第二节	“格致之学”的创获	(269)
第四十一章	洋务时期域外史地研究的新拓展 ..	(282)
第一节	郭嵩焘对西方的考察与研究	(282)
第二节	王韬对普鲁士、法国和日本史的研究	(290)
第三节	黄遵宪的日本维新史研究	(299)
第四节	从传统实学通往近代新学的桥梁 ..	(307)

第四编 中国实学在日本、朝鲜 的传播及历史影响

引 论	(315)
第四十二章 明代元气实体论与日本德川时代的实学	(319)
第一节 罗钦顺的实学对安东守约、贝原益轩的影响	(319)
第二节 吴廷翰的实学对伊藤仁斋、中江岷山、山片蟠桃的影响	(335)
第四十三章 明清实测之学对日本实学的影响 ..	(348)
第一节 《本草纲目》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	(348)
第二节 方以智的“质测之学”与三浦梅园的实测之学	(358)
第四十四章 陈元赞的实学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	(365)
第一节 陈元赞及其在日本形成的学派	(365)
第二节 传播公安派文学及其对日本文学革新的影响	(369)
第三节 创编和传授柔道	(379)
第四节 传授制陶术及其他技艺	(385)
第四十五章 清代科技实学与朴齐家的《北学议》	(390)
第一节 四次燕京之行	(390)
第二节 北学议与北伐论之辩	(393)
第三节 《北学议》的实学思想	(397)
第四十六章 清代考据实学与金正喜的实学思想	

.....	(404)
第一节 金正喜的生平及其对清初考据实学 的态度	(404)
第二节 阮元的求是学风与金正喜的实事求是	(407)
第三节 翁、阮的指导与金正喜的金石书法 成就	(410)
第四十七章 清初经世实学与丁若镛的实学思想	(412)
第一节 丁若镛的生平及其对清初实学的态 度	(412)
第二节 清初经世实学对丁若镛的思想影响	(415)
第三节 “西学东渐”对丁若镛实学的影响 ...	(425)
后 记	(430)

引 论

从清嘉庆以降,尤其是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清王朝开始由乾嘉盛世滑向晚清乱世。从道(光)咸(丰)到同(治)光(绪)的五六十年间,是中国经世实学思想的高涨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古典传统实学通向近代“新学”的转型时期。

晚清时期的经世实学,虽然是围绕着“救亡图存”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但是根据晚清实学发展的深度与广度,又可以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从 19 世纪 20 年代到 60 年代的道咸经世派的实学思潮与 19 世纪 60 年代到七八十年代的洋务派的实学思潮。道咸经世派与洋务派的实学思想之间,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时代的变异性,使晚清经世实学呈现出五彩缤纷的历史画面。

从嘉庆后期开始,由于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而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土地兼并的加剧,统治者生活的奢侈,吏治的日益腐败,导致了 1796 年川楚地区的白莲教农民起义,转战五省,历时九年。1813 年,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又爆发了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乃至率众直闯紫禁城,严重地威胁了清王朝的统治。嘉道年间,英国侵略者除在沿海进行武装挑衅、加紧鸦片走私活动外,还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武装叛乱。正如魏源在《圣武记叙》中所说:“荆、楚以南,有积感之民焉。生于乾隆征楚、

苗之前一岁，中更嘉庆征教匪、征海寇之岁，迄十八载，畿辅靖贼之岁，始贡京师，又迄道光征回、疆之岁，始筮仕京师。”这说明，从嘉、道以后，不仅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十分激烈，而且中华民族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整个社会处于空前动荡的氛围中。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由忧患意识而萌发的经世实学，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道、咸年间，把实学推向高潮，除了社会阶级根源外，还有学术流变的内在原因。随着清王朝由盛转衰，文字狱已经松弛，统治者的文化控制也大为削弱，使士大夫有可能“相与指天画地，规天下大计”。没有这样的政治气候，实学思潮走向高潮是不可能的。同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乾嘉汉学自身的弱点和不适性也充分暴露，受到时人的猛烈批评。所以，一些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士大夫不再满足于“皓首穷一经”的考据之学，便由古文经学走向今文经学，由“纯汉学”走向“经世实学”，成为当时一种带有趋向性的学术转向。以庄存与（1719—1788）、刘逢禄（1776—1824）及其学生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为代表的常州古文学派和以包世臣（1775—1855）为代表的道、咸间经世实学派的出现，就是这种学术转向的反映。他们既批评宋学，也批评汉学，即所谓“恶夫短钉为汉，空腐为宋。”（《魏源集》上册，《武进李申春先生传》）他们以“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匡时”为宗旨，重新恢复和发扬了清初的经世思想和批判精神，就是势在必然的了。

道、咸年间的经世实学思潮，是以传统的“经世致用”为其基本特征，社会内容极为丰富。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四点：

一、针砭时弊的批判精神。

道、咸年间的经世学者，都是以挽救社会危机为己任，以匡济天下而自命，或以“国医手”自期，或被时人推尊为“国医”。全

面地揭露了晚清社会的各种弊端。包世臣痛恨清代各级官吏营私舞弊的鄙劣行径,指出:“近者农民之苦剧矣。为其上者,莫不以渔夺牟侵为务,则以不知稼穡之艰难,而各急子孙之计故也。”(《安吴四种》卷8)在《农政》一文中,他对地方官绅鱼肉乡民的罪行揭露说:“自士不兴学,鄙夷田事,高者谈性命,卑者矜词章,泊乎通籍,兼并农民,盖田输两税复摊丁徭,则一田而三征,内外正供,取农十九,而官吏征收,公私加费,往往及倍。绅富之户,以银米数多,而耗折较轻;力作之民,以银米数少,而耗折倍重。是故鬻狱卖法,分绅富之膏肥;折粮加漕,浚茆独之登血。至于申诉所及,绅则势胁,富则利诱,听论常速,以助其逾荡武断之威;乡里愚民,不识城市之区,未睹官吏之面,自非极屈,鲜敢吁号,而官则受词若罔闻,吏则居奇以责賂,偶有蹈触,厥罚必行。故农民终岁勤动,幸不离于天灾,而父母妻子,已迫饥寒;又竭其财以给贪婪,出其身以快惨酷,岁率为常,何以堪此?”(《安吴四种》卷25上)龚自珍对晚清官场的苟且、谄媚、寡廉鲜耻的丑态也有切肤之恨,认为“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工。”他们只知“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作为”,是一群“缚草为形,实之腐肉”的傀儡。魏源谴责清朝官吏“除富贵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是一批贪婪竞进、庸碌无能之辈。林则徐指责各级官吏“色厉实内荏,骄昼而气昏,岂其尠才智,适以资攀援,横棱计滋巧,刀笔文滋繁。峻或过申商,滑乃愈衍髡。”徐继畲痛斥清代官员“廉隅既毁,罔惜声名,竭其聪明才力,尽卒于纳贿之一途,至于民生之休戚,地方之利弊,无复有过而问焉。”他们只是“长于酬应,善于逢迎”,一年之中主要忙于“营求迁擢”。龚自珍还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尖锐地批判了“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君主专制,提出了“君臣共治”的政治理想。在经世学者的笔下,不仅官场腐朽黑暗,社会经济也是

日趋凋蔽，民不聊生。对此，包世臣描绘说：清代“吏无大小，各忧其贫。军国告需，上勤宵旰，调发不给，捐输不继，雍梁荆豫，跳梁百万，而兵弁望风逃北，郡邑为墟，淮泗偶被水灾，数百为群，露刃望食者千，莫谁敢何！”龚自珍一针见血地指出清王朝“开捐例、加赋、加盐价”，是“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致使广大人民或“取诛戮，或冻饿以死。”在魏源的著作中，卖妻鬻子者有之，冻死饿死者亦有之。张际亮则对“吴民多苦难，朽骨连江村”，“室有冻死骨，野有逃荒民”的惨状，表示极大的同情。在人才问题上，龚自珍痛斥清代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指出“一限于资格，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面对“一睨人材海内空”的局面，发出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激昂呐喊。对于清代的用人之弊，魏源深刻地揭露说：“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吏案例之才，举天下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指出文人学士终生“书小楷，诗八韵”，诚所谓“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痛斥乾嘉汉学家是“书蠹”，对其“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的危害，也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林昌彝对清代科举制度甚为不满，抨击说：“士子以腐烂时文互相弋取科名以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

二、革新时弊的经世思想。

道、咸经世学者不但以敏锐的目光“洞见症瘕”，而且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拯救之策。针对清代漕运积弊，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中，主张以海运代漕运，即主张雇用私人商船，把江浙一部分漕粮，由海道运送北京，以减少运输耗费，保证京城粮食供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漕运之弊，他主张“先减（南漕）运什之一，以此米价及运费”，在京畿地区设置官屯，召募农人垦殖。认为采取这一措施，“漕可罢，赋可宽”，“百世之勋可集，而东南之困可苏

也。”魏源亦主张“以海代河，商代官”，认为海运“优于河运者有四利：利国、利民、利官、利商。”陶澍、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积极支持魏源等人的这一漕运改革，并且在他们主管的部分地区实现了这一社会改革。针对晚清盐业的衰敝，他们主张在盐法上，以“票盐”代替“纲盐”，即主张废除“纲商”的垄断特权，改行“盐票”，允许商人领票买盐，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盐税后，即可自由运销所买食盐。他们在盐业中实行自由贸易，如同他们在漕运中提倡漕粮商运一样，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个新的突破。针对江河之患，包世臣在《筹河四略》中，认真总结历代治河经验，提出御坝、浚淤并举的治河方法。魏源在《筹河篇》中提出黄河“唯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主张以建立分湖区，禁止围湖筑圩等办法来救治长江之患。针对当时白银外流的问题，王夔提出纸币说，包世臣亦主张“以纸为币，不以银为币”。在货币问题上，魏源、林则徐则高于包世臣，为了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他们主张以银为币说，实开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河。为了挽救农业危机和解决社会贫富不均的问题，包世臣提出的州县屯田法，龚自珍提出的农宗法，虽没有超出重农主义的范围，但是有时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中，也显现出某些新的思想闪光，如包世臣针对“重本抑末”的传统思想，提出“本末皆富”的观点，作为“千古治法之宗”和“子孙万世之计”，颇具新意。道、咸经世学者面对当时鸦片的大量输入所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不但揭露了吸食鸦片的危害，而且也提出了各种禁烟的方案。在禁烟方案上，不管是以黄爵滋、林则徐、魏源、陶澍、包世臣、徐继畲等人为代表的严禁派，还是以吴兰修、许乃济等人代表的弛禁派，他们尽管在策略上有分歧，但都是为解决由于鸦片泛滥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作出的一种努力，其爱国主义精神是一致的。在治兵上，魏源主张以“除弊”、“节用”、“塞患”、“开源”四法来解决兵饷

问题,达到“强兵”之目的。在政治上,龚自珍针对君主专制,提出“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主张君臣“共治吾天下”。这与清初顾炎武的反对“独治”、提倡“众治”的思想是遥相呼应的。龚自珍还就扩大内阁权力,将军机处改为“内阁之分支”,提出过具体改革意见。他们还主张开放言路,废除有名无实的“谏官”,以“人皆谏官”,“人尽其言”来代替之。黄爵滋主张“广贤路”。林则徐在一定范围内“肃清吏治”,将一切不合格的官员或降或革。在“一祖之法无不敝”的认识基础上,他们主张“更法”以达到革故鼎新之目的。

三、边疆与域外史地学的崛起,是道、咸年间经世实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说,前面所述的漕、河、盐、农、兵、吏治、人才诸大政是着重解除“内忧”的话,那么道、咸年间史地学的兴起则主要是应付“外患”的产物。正如晚清姚莹所云:他所以“喋血饮恨”来撰写《康輶纪行》,完全是为了“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沦于鬼域。”(《东溟文后集》卷8)根据研究对象不同,道、咸间的史地学又分为两部分:一是探究西北史地,从筹边防;二是谈瀛海故实,以谋外御。从嘉庆以降,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少数民族在边疆多滋事,再加上沙俄和英国对西北地区的威胁,形成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面对这一形势,经世学者不得不留心于西北地区的史地之学。其代表人物主要有:祁韵士、徐松、沈垌、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人。祁韵士(1751—1851)立足于经世,撰有《新疆要略》、《西域译地》、《西陲总统事略》、《万里行程》等书。徐松(1781—1848)谪伊犁后,在将军松筠支持下,以“才不为世用,乃著经世书”的情怀,足迹遍于新疆南北,撰成《新疆识略》12卷,“有图有叙,论山河之襟带,城郭之控制,兵食财富之储积,田野畜牧之繁博;条分件系,详核该洽。”(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第17)

此外,他还通过实地考察和“遍稽旧史方略”,撰成《西域水道记》、《新疆事略》、《西域水道记校补》、《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长春真人西游记考》等书。龚自珍也长于西北舆地之学,撰有《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力主迁徙内地百姓到西北垦荒戍边,以增强西北的防御力量。他还撰有《书番禺许君》、《东南罢番舶议》,着重讨论对付西方殖民者对东南沿海的侵略问题。魏源为了救治晚清之时弊,十分注意明史与元史的研究,撰有《明代兵食二政录叙》、《西北疆域沿革图》、《元代征西域考》、《元代西北疆域考》、《元史新编》等,以便为清王朝提供“殷鉴”,告诫清朝统治者不要重蹈元、明亡国之覆辙。张穆(1805—1849)与徐松等人交好,“剧谈西北边外地理”,撰有《蒙古游牧记》十六卷,“读史者得实事求是之资,临政者收经世之益”。何秋涛(1824—1862)不同于徐松、张穆等人,他在鸦片战争的推动下,将目光由开发西北边疆转向巩固边防,以抵御沙俄入侵,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面对沙俄侵略西北边疆所造成的巨大危机,撰成《朔方备乘》一书。自称著述此书的目的是:“一曰宣圣德以服远人,二曰述武功以著韬略,三曰明曲直以示威信,四曰志险要以昭边禁,五曰列中国镇戍以固封圉,六曰详遐著地理以备出齐,七曰征前事以具法戒,八曰集夷务以烛情伪”。此外,沈垚的《新疆私议》,姚莹的《康輶纪行》等,都是道、咸学者研究西北史地学的重要经世之作。

道咸年间,除了探讨西北史地学之外,面对英国等殖民者的入侵,经世学者也掀起了研究域外史地学的热潮,他们针对“详中国而略外夷”的中国传统史学的缺陷,大力“寻求异域之书,究其情事”,以谋“制夷之策”。林则徐作为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深知“不谙夷情”之苦,提出了“师敌长技以制敌”的口号,有计划地翻译外国书刊,如《澳门月报》、《四洲志》、《华事夷言》

等。他在遣戍伊犁期间，著有《荷戈纪程》，天才地提出了“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5）的著名论断。魏源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100卷。他不仅揭露了英国侵略者扩张本性，而且也向清王朝发出了“严戒备”的警钟。在《海国图志》中，依据他对外域的周密观察与研究，提出了“以守为攻”、“以守为款”、“以夷制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等抵御外侮的方略。在他看来，所谓“夷之长技”者，主要有三：战舰、火器、养兵练兵之法——这些都是中国人应当学习的。他建议在中国建立造船厂、火药局等机构。他认为“师夷”并不限于军事技艺，还要求在经济上努力发展工商业，在政治上赞扬美国的联邦制和民主选举制。继林则徐、魏源之后，徐继畲所撰《瀛环志略》，更加全面地介绍了西方文明，其中包括对美国的“三权分立”的民主政体的介绍。梁廷枏的《海国四说》全面地介绍了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对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介绍尤为详细，在中国实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四、史学经世的思想。

道咸年间的学者继承和发挥中国史学经世的优良传统，突破中国历来“重古略今”的嗜古之弊，十分注意探讨“现代史”并把它作为重要的经世武器，表现出史学研究由“嗜古”转向“究今”的新动向。魏源编纂的《圣武记》与《道光洋舰征抚记》，首开清代研究“当代史”之新风。魏源的《道光洋舰征抚记》是以“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为目的。在《圣武记》中，他认为“不师外洋之长技，使兵威远见轻岛夷，近见轻属国，不可也”。梁廷枏的《夷氛闻记》与夏燮的《中西纪事》，也都是探讨晚清“现代史”的重要著作。在《中西纪事》中，夏燮正确指出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源“在市而非起于鸦片也”。他透过鸦片而看到这场战争背后的经济利益，揭示了英国发动鸦